

著◎胡曾

咏
歸
樓
主
詩
詞
集

冷浩題



學苑出版社

曾胡◎著

咏歸樓主詩詞集

冷浩題



學苑出版社

图片在版编目(CIP)数据

咏归楼主诗词集/曾胡著.—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77-3151-4

I.咏… II.曾… III.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2976号

责任编辑：徐建军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本尺寸：150×245mm 1/16

印 张：20.37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作者近照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論語·先進第十一』

『一任詩心面自然』的心靈吟唱

——讀曾胡先生《詠歸樓主詩詞集》

一、『詩人何爲』的叩問與當下詩歌的轉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的中國可謂是一個『無詩的時代』。不獨古典詩歌自五四以後漸趨消亡，即便現代新詩，自一九八九年海子、駱一禾猝死以來，戈麥、顧誠、徐遲、昌耀等人也相繼自殺，以致有人由當代詩人之死而發出詩歌死亡的悲識。

其實，認爲詩人之死象喻性地表達了詩歌之死，未免有些聳人聽聞，但如果說它象喻性地表現了詩人、詩歌與當下時代的緊張關係，却非言過其實。恰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通過荷爾德林的詩歌所提出的問題：在這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爲？[〔]當代詩人于堅在其詩學隨筆《詩人何爲》中對這一問題曾預以明晰的解析：『我們已經置身於我們一嚮盼望的市場經濟的時代。無論是天堂還是地獄，我們無從逃避。就像任何一個時代那樣，新的時代又在它的十字路口提出這樣的問題：詩人何爲？——要麼自殺。要麼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要麼選擇並承擔責任。烏托邦正在死去，『田園將蕪』。這是一個由個

人，而不是由集體：由行動而不是由意識形態承擔責任的時代。」^(一)

的確，在這樣一個財經掛帥的市場化時代，傳統文人的詩意感受已被完全擠壓到了一個令人尷尬的境地：千峰競秀的黃山，游人如織，熙攘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叫賣聲，你從哪裏去尋找到詩意？往日幽靜深邃的西子湖畔，放眼望去，湖中擠滿游船，岸邊坐滿游人，馬二先生當年還只是覺得：「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搜索滿是八股文的枯腸後，不禁嘆道：「真乃「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如今連這感覺也找不到了。

詩意感受的遲鈍不僅有外部的環境擠壓，更有詩人自身的心靈噬咬。興觀群怨的傳統詩學精神，濟世憂民的詩人內心潮動，使得當代的許多詩人們仍希求著借助詩歌的言說承擔起『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社會責任。然而，『歷史的錯位似乎在一夜之間造成鉅大的缺口』^(二)，原先熟悉的世界忽然變得如此陌生，本被視為應預批判的靶子忽然迷失了，傾情的歌頌也沒人表示領情。恰如詩人歐陽江河在其被廣為關注的《八九後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一文中所指出

的，進入九十年代後，『在我們已經寫出和正在寫出的作品之間產生了一種深

刻的中斷，詩歌寫作的某個階段已大致結束了。許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遠鏡被顛倒過來，以往的寫作一下子變得格外遙遠，幾乎成了隔世之作，任何試圖重新確立它們的閱讀和闡釋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導到一個不復存在的某地，成爲對閱讀和寫作的雙重消除。^(四)詩人們因此感到了濃重的失落，從而發出『詩人何爲』的沈重嘆息和無奈追詢。

這種頗帶點悲涼和滄桑的『詩人何爲』的追問，其實深層次地暴露了許多詩人難以排解的心結：他們還仍然無法擺脫已然凝結於他們血液中的傳統詩教的桎梏，還是把自己想像成文化英雄、社會鬥士抑或先知和預言家，把詩當作

一種行動的語言，改造社會的工具。

但如果我們改變一下這一追問的言語秩序，追問『何為詩人』？也許這個命題不致顯得如此沈重。詩歌的定義很多，簡要而言不過是用超越語言秩序的言說，表達自我與社會存在的關係。追問『詩人何為』的詩人，實際上過度放大了自我的社會承擔意識，一旦時代語境發生變異，便常常迷茫而失去自我。就像海子《春天，十個海子》中的那個『黑夜的孩子』，他『不能自拔，熱愛着空虛而寒冷的村莊』，然而身後那個村莊的大門却砰然關上，他也就祇有『傾心死亡』。而『何為詩人』的追問，則將我們帶到了另一個層面的思考，

即淡化自我對社會的拯救感，放大自我存在的歸屬感。換言之，詩人不祇是用詩的語言言說自我與社會存在的關係，還應該真誠地面對自我的心靈存在，真切地體露自我的心靈感悟。所以，在八十年代即已嶄露頭角的詩人王曉妮，九十年代不僅在詩中而且在文章中呼吁『重新做一個詩人』：『應當有另外的人，只爲自己的心情去做一個詩人，他要另外去勞動才能不饑餓，他要打一盆水才能除掉灰塵。他是最平凡的人。他可以寫字，也可以不寫。他只是在那些被鎖定了的生活之中，感覺空隙，在空隙中發現光芒，時限極短，光活泛起來，生動起來。他在那會兒遭遇到另外一個飛掠而過的世界。』^(五)即反對將詩

歌作爲一種社會職業，而應將之作爲一種心靈的需要。

倡導面嚮心靈的寫作，已逐漸成爲九十年代後詩人的一種自覺。詩人們追求的不再是社會診療式的寫作，而是借助詩的言說以滿足個人回憶、釋放內心焦慮。詩收攏了自己的野心，從驅動時代變革而轉向了對個人意識和想像方式的關注。九十年代後詩人寫作姿態的這種轉換，盡管有點苦澀，但於詩歌命脈的延續却未必毫無意義，最起碼，因時代語境的轉換而導致的詩人與時代的緊張關係由此得到了舒緩。猶如演員忘却觀衆的掌聲而只關注於自我表演的完美一樣，九十年代後的詩人們也不再關注其詩作對讀者和社會的影響力，而是轉

嚮了對自我內心的叩問，致力於詩歌本體存在挖掘與探詢，諸如柏驊、呂德安、陳東東等，他們的詩作均以感覺的豐富和語言的優美而見長，現實的雜質經由他們心靈的過濾變得單純而空靈。

二、一任詩心面自然的心靈吟唱

與現代新詩寫作在九十年代後的轉型稍稍有別，中國古典詩詞寫作，早在五四後便陷入了上述新詩在八十年代後的尷尬處境。盡管古體詩詞寫作代不乏人，但除了以政治家身份介入詩詞創作的毛澤東、陳毅、郭沫若等，其所作確

乎因政治意識的濃烈而引起時代社會的強烈呼應而外，其他古體詩詞作家，大都是些學養深厚的學術名家，諸如饒宗頤、程千帆、霍松林、錢仲聯等；他們的創作則多是自娛自樂式的，是一種純粹的『私人化』的寫作；然建國後高漲的政治熱情，文革中遭遇政治暴力的痛苦，使得他們的詩作仍在詩人無為的時代做着無謂的有為嘗試。過度的風雲變遷，泯沒了出自心靈的吟唱。九十年代後，伴隨着新詩寫作轉型的呼喚，古體詩詞作家中，也出現了許多純粹追尋心靈足迹的吟唱者。呈現在大家面前的《詠歸樓主詩詞集》的作者曾胡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曾以天矯身影馳騁於譯界和商場的曾胡先生，其致力於古體詩詞創作，與晚清詩人黃遵憲一樣，是真正的『餘事做詩人』。祇是黃遵憲是在政務之餘而做詩，故其詩作中過度的時代感傷，淹沒了詩人自我心靈的表露。曾胡先生自號咏歸樓主，得名於《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面對夫子『各言其志』的探問，曾皙不是如子路、冉有、公西華那樣，以胸懷天下的政治承擔意識為依歸，而是嚮往着徜徉自然的生命淘洗。曾胡先生取之為號，表達的正是他的詩學追求：在自我與自然的心靈對話中，獲致一

種生命淘洗的自適。

《詠歸樓主詩詞集》共選有作者二〇〇一—二〇〇八年的三百多首詩詞，

如果按照傳統詩學『知人論世』的法眼檢閱這些詩作，詩評家們會得出心路歷程之類的種種理論概括，這樣的批評實際上難搔癢癢，也未必真正能體悟得了作者那超越社會羈縛之後的真實生命感受。實際上，如前文所論，從『詠歸樓主』之號的命名中，可以探繹到作者的詩學追求，不是家國社會的沈重責任，而是自適情懷的生命展露。而商海征戰的生命歷練，更使得作者能够在無需擔憂種種物性的干擾，諸如成名的企盼、稿酬的高低，甚至各處游歷的車馬